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中国美学通史

叶朗 主编 朱良志 副主编

5

宋金元卷

潘立勇 陆庆祥 章辉 吴树波 著

叶 朗 主编 朱良志 副主编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中国美学通史

5

宋金元卷

潘立勇 陆庆祥 章 辉 吴树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学通史. 第5卷, 宋金元卷/叶朗主编; 潘立勇等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214-09236-6

I. ①中… II. ①叶… ②潘… III. ①美学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8121 号

中国美学通史

叶 朗 主编 朱良志 副主编

第五卷 宋金元卷

潘立勇 陆庆祥 章 辉 吴树波 著

策 划 编 辑 王保顶

责 任 编 辑 孙 立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插页 2

字 数 34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9236-6

定 价 4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卷分工：

本卷由潘立勇拟定提纲、统稿。

潘立勇(浙江大学) 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第一节。

陆庆祥(湖北理工学院) 第三章;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

章辉(玉溪师范学院) 第二章;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

吴树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其中第七章第一节有关休闲文化的论述参考了章辉博士提供的材料;第四章第三节有关陆象山心学美学智慧的论述,参考了潘立勇指导的王煦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内容。

总 序

一

中国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美学理论遗产。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国当代的美学学科建设,对于我国当代的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对于 21 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对这份美学理论遗产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尝试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地研究,出版了一批中国美学史的著作。我们试图在前辈学者和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美学通史,力求勾勒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

二

我们在《中国美学通史》的写作中注意以下几点:

一、《中国美学通史》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的发展史。美学是对审美活动的理论性思考,是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所以这部美学通史不同于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等著作。

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美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发展史。一个时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形成和发展,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基本精神和总体风貌。这部通史重视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力求通过这样的研究勾勒出一个理论形态的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

三、这部通史注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线索,不同于孤立地介绍单个的美学家和单本的美学著作。

四、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限于少数学者在书斋中做纯学术的研究,而是与人生紧密结合,与各个门类的艺术实践紧密结合,它渗透到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处。因此,我们这部通史既注意在哲学、宗教等相关著作中发现有价值的思想,又注意发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美学思想,同时还注意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美学理论与现实人生相互联结的各种材料,以更深一层地显示美学理论的时代特色。

五、这部通史注意新材料的发现,同时力求以研究者独特的眼光去发现和照亮历史材料中的新的意蕴。这部通史的写作还力求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部通史从上古时期的商代开始一直写到1949年,反映中国美学从上古时代到近现代的全幅波动,但并不意味着把它写成过往时代历史材料的堆积,我们力求使这部通史反映当代的理论关注点,反映当代的美学理论的追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它成为一部闪耀着当代光芒的美学史。

三

这部《中国美学通史》是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由叶朗任主编,朱良志任副主编。全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美学通史共有八卷,分别是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

这部书的著者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为主,同时邀请了国内高校的一批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参加。本书从2007年启动,前后经过六年多时间。全书初稿完成后,又组织几位学者进行统稿。参加统稿的学者为:叶朗、朱良志、彭锋、肖鹰。统稿时对各卷文稿作了若干修改,其中对个别卷作了较大的修改。

这部美学通史被列入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相关部门的帮助,很多学者参加过本书从提纲到初稿的讨论,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书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特殊的社会背景	1
第二节 人文的成熟与转向	10
第三节 从汉唐气象到宋元境界	16
第二章 宋代经世致用的美学观念	40
第一节 宋初政治家复古与致用的美学取向	42
第二节 范仲淹、司马光的致用美学思想	46
第三节 王安石的政治美学及其时代意义	55
第四节 陈亮、叶适的事功美学观	69
第三章 苏轼及其文人集团的美学思想	76
第一节 欧阳修、梅尧臣的审美追求	77
第二节 苏轼尚“平淡”的美学观念	90
第三节 苏轼的“随物赋形”说	101
第四节 苏轼对日常审美生活的关注	104
第五节 黄庭坚、范温的“韵”论	119
第四章 朱熹、陆九渊暨理学家的美学思想	135
第一节 北宋五子的伦理美学	137

第二节	朱熹理学中的美学思考	158
第三节	象山心学中的美学智慧	192
第五章	宋元画论中的美学思想	215
第一节	黄休复论“逸”品的美学意义	217
第二节	郭熙以“远”为中心的绘画美学	220
第三节	董道的“生意”与“生理”说	224
第四节	元代文人画的美学旨趣	229
第六章	宋元时期诗词曲论中的美学思想	237
第一节	南宋江西诗论的美学见解	241
第二节	陆游、杨万里的美学观	247
第三节	严羽的美学贡献	272
第四节	元好问及金代崇尚阳刚的美学趣味	285
第五节	元代曲论中的美学思想	297
第七章	宋代的休闲文化与美学	313
第一节	宋代休闲文化繁荣的原因	315
第二节	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	322
第三节	文人士大夫的休闲之境	337
第四节	从皇室到民间的休闲风尚	354
参考文献		369
索引		375

第一章 导 言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其 400 余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后期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尤其宋朝(960—1279)是中国古代自唐代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汉族政权,这一朝代的社会文化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方面是民族危机深重,另一方面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是学术、思想的相对自由;一方面是性命道德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却是感官享受的全面宣泄。这种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论思维的成熟。在文化哲学和理论思维上,如果说先秦是中华人文的奠基和发端,魏晋南北朝是中华人文的自觉,那么,宋代则是中华传统人文的全面成熟和近世人文的兴起。这个特征同样体现在宋代美学领域,它的理论的思辨性、学派的多样性、学者的群体性,皆有其他时代难以企及之处。而市民阶层的形成、近世人文的兴起、休闲文化的繁荣,又使宋代美学体现出走向近代的特征,中国古代美学由此告别汉唐气象,进入宋元境界。

第一节 特殊的社会背景

从历史上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转折点的两宋

社会基本结构,具有突出的外强内虚的特征,这种社会背景使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审美意识形成了相应的特征。

宋代社会及其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矛盾是多重性、错综复杂的,可以说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朝代汇集了有如宋代这样错综复杂而又具有对峙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就社会基本结构而言,经济文化的空前发达与民族危机的极端深重,即繁荣与忧患的同时并存;就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而言,道德规范的极度强化与生命情感的肆意追求,即伦理和情欲的并驾齐驱(如理学与宋词的双璧生辉、儒学道统与禅悦之风的并行不悖);就社会审美意识结构而言,审美伦理教化说与审美自由论感受,即功利与超功利的对立并峙,如此等等,都是这种内在矛盾特征的体现。

一、特殊的社会结构

中国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朝代像宋代社会这样表现了如此对立复杂的矛盾状态,汇聚了如此交织迭合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是经济文化的空前发达,一方面民族危机也达到很高程度。而靖康之变所造成的宋代社会由鼎盛而式微、由升平而离乱、由荣耀而屈辱的剧变,更使两宋社会呈现了一幅大起大落、大荣大辱的历史场景。对此,哲学史家赵纪彬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朱熹的时代特征是经济发展下的民生问题的严重及民族危机与文化——尤其是哲学遗学的丰富。”^①

我们先看看宋代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的这一面情况。由于宋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在土地所有制上,贵族官僚按封建等级世袭占有土地的方式基本瓦解,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在剥削方式上,“部曲佃客制”逐渐由“租佃制”代替,实物地租逐渐取代了劳役地租;在劳动者地位上,人身的依附束缚相对减轻。以土地的商品性质增强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地位减轻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关系调整必然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而宋代中央集权下相对宽松与开明的经济政

^①《赵纪彬文集》(一),第28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策,又为这种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来自上层建筑的保证;因此,两宋的物质文明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南宋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粮食产量、垦田面积、耕作工具与生产技术及水利事业、农产品商业化诸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人口也大大增加,这些反映了宋代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宋代经济的发达,更体现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例如在手工业方面,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产品产量与生产技术明显提高,尤其是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与印染业等等迅速发展;在商业方面,大都市迅速形成(如唐代十万户的城市仅十一个,北宋则达四十个),城市商业繁荣,市镇与集市贸易及沿海贸易活跃,工商业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另外已开始推广纸币,据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氏研究,当时通行的货币,已有公据、关子、盐钞、茶引、交子、会子等种类。^①在社会意识上,已有不少人改变传统的认商为末的看法,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②。

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文明史上更是以其登峰造极的成就而辉映史册。陈寅恪曾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之语盛赞赵宋文化,邓广铭也认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一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④。宋代统治者采取文治靖国的政策,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对宋代的士人给予了前朝从未有过的优厚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和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如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不以言罪人”和“优待文士”。这种重文优士的政策与发达的社会经济及前代的文化遗产结合为宋代的文化繁荣发达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与保障,极大地

① [日]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刘惠之,刘希宁译,第261—262页,上海:读书出版社,1937年。

② [宋]陈耆卿:《嘉定赤诚志》卷三七,《风土门·重本业》,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6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品位的提升、审美文化的发达,使有宋一代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史哲学及社会教育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科学技术方面,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与使用,新超星的纪录和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图的绘制,杨辉的开方法、秦九韶的三次方程式的运用,以及沈括的《梦溪笔谈》、李诫的《营造法式》、丁度等的《武经总要》等科技著作的出现,无不标志着科技的先进水平和辉煌成就。

在文学艺术方面,宋词以可与唐诗媲美的姿态异军突起,宋文以唐宋八大家中占六家的风采彪炳史册,而话本小说和戏曲等市民趣味的艺术样式的兴起更使文坛别开生面。还有宋代的山水花鸟、行书狂草……几乎没有一个艺术领域不产生了足与前朝后代争辉的巨观。宋代的绘画书法、美术工艺、园林营造、戏艺杂技等等都达到繁盛的水平,宋代山水画的气势博大与意境隽永,被誉为是代表着中国画的最高艺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艺术理论和美学论著的大量出现,最令人瞩目的是诗话的兴起。著名者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等。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现存完好的宋人诗话有的四十二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撰辑而成的共四十六种,已佚或尚有佚之未及辑者五十种,可见其成果之富。

在经史哲学方面,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出现了以理学为主干的宋学,理学突破章句训诂之学,以强思辨、精义理、深邃博大而彪炳一代。《新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吕祖谦和浙东史学的出现,以及《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上千卷之巨的大类书的编纂印行,则充分显示了非前朝可及的宋代史学的实绩及集大成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成就。

在社会教育方面,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的盛行,以著名的四大书院为代表的民办学术教育机构的遍地林立,都标志着宋代社会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

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

此外，宋代文化发达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化群体的出现。这首先表现为同一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有杰出贡献的文化人物。以著名思想家为例，从生年上考察，北宋之欧阳修（1007年）、李觏（1009年）、邵雍（1015年）、周敦颐（1017年）、司马光（1019年）、张载（1020年）、王安石（1021年）、沈括（1031年）、程颢（1032年）、程颐（1033年）；南宋之朱熹（1130年）、张栻（1133年）、吕祖谦（1137年）、陆九渊（1139年）、陈亮（1143年）、叶适（1150年）等，两大思想家群体的涌现都集中在二三十年之间，这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其次表现为学派群体的形成，《宋元学案》共一百卷，除六卷元儒、两卷元祐、庆元党禁外，其余各卷均为宋儒。每个学案均录学派同人几十人乃至百人以上。两宋期间学派林立，仅理学内部就有濂学、关学、洛学、闽学、陆学、象数学等学术派别。不同学派之间互相交流争论，辨析诂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

总之，宋代文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与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同时并存的是民族危机和民生问题的极其严重。翻开中国历史的长卷，一个朝代在绵延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不曾统一海内者，也唯独赵宋王朝。赵宋先后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峙鼎足，至南宋则剩江南半壁江山，并最终为蒙古民族所灭。史学家云：“唐代踔厉向外，宋代则沉潜向内；唐代能征服人，宋代人则被征服于人。”^①宋代在文治勃盛、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国力的虚弱。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之广，而耗费却数倍于前，这除了用于满足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外，很大部分是被用来维持宋朝苟且偏安的局面。在宋代君王心目中，“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宋太宗语，见《宋史·宋绶传》），而“安内靖国”才是稳固统治的要事。史称宋代治国体制和策略是“重文轻武”，或“重内虚外”，如果说

① 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序，第3页，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

“重文轻武”中的“轻武”未必是史实(因为宋代开国之初就形成了“国倚兵而立”的局势,内扰外患始终不断,宋君岂有自毁长城之理);那么,“重内虚外”中的“虚外”却的确是伴随宋代 300 多年的现实与危机。朱熹曾指出:“本朝鉴于五代藩镇之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也收了,州郡逐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虜骑所过,莫不溃散。”(语类卷一二八)宋代开国之君在鉴于唐末五代武人拥兵自重之患,以及自身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获取政权的史实,深知武将篡夺之祸必须防范,于是采取了皇帝独揽大权、兵将分离、将帅互制的制衡方式,其结果是导致了封建政治机制和军事机制的日益僵硬、呆滞,御边能力的空前虚弱。尤其是自宋太宗自出兵收复失地这一努力成为泡影之后,更是一改汉唐拓土开业之雄风,而沉潜制治于靖内。不仅如此,宋廷上下还染上了难以去除的恐敌症,对外族入侵者一味退让,不惜以输帛纳币,甚至下跪称臣的方式来求得一时之苟安。尽管这一时代不乏抗敌报国之忠勇之将(如岳飞、辛弃疾等),也不乏希求变革、重振国威的有识之士(如范仲淹、王安石等),但大都以无力回天乃至祸及自身的悲剧告终。民族危机之深化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对外屈膝求安,在内则穷奢尽欲,以致“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宋史》卷一七三),造成贫富悬殊、官民对立,致使宋三百年间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整个时代烽火四起,边患不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至南宋更为严重。朱熹曾指出当时社会“内至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发不受病”(《戊申封事》,《文集》卷一一)。于是,民族危机和民生问题自然成了当时许多仁人志士着意思考的主题。从总体来看,这种繁荣与忧患交错并存的局面对宋代美学的特征有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心理的复杂性

宋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存在着复杂性。当人们想寻找最能体现宋代时代特征的文化专名时,首先会想到两个名词,一个是“理学”(或

曰宋学),一个则是“宋词”。尽管由于着眼点大小的不同,人们在选择概括名词时会侧重其一,如南宋陈郁指出:“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惟是学大明,自孟子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藏一话腴》甲集卷上);近人王国维则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统“一代之胜”(《宋元戏曲考·序》);前者是着眼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推崇宋代道学(理学)的成就,后者则是着眼于文学艺术这一自成系统的历史文化层面而强调宋词的影响;但他们致力于把握时代特征而刻意寻找体现宋代文化之突出成就的名词这一着眼点却是相同的。^①

最能典型反映宋代文化心理结构的正是“理学”与“宋词”的双向并峙、情理互补。看起来这两种文化形态形式和旨趣迥异,甚至互相冲突:理学对形上道德本性的追求,体现了社会对个体成员理性的最高规范,而宋词则表达了宋人对形下情感本性的追求,体现了个体对生命存在的感性的最细腻品味;一则主理,一则言情。二者既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构成了宋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

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其兴起和发展上也具有时间的同步性。一般认为理学肇源于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②,经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之酝酿,周敦颐之开创,张载之奠基,至二程建其大体,而再至南宋朱熹集于大成。词亦产生于唐朝中朝,宋初转盛,经北宋的发展至南宋而圆熟。就代表人物讲,理学宋初三先生之于词家晏、柳,程颢程颐之于苏轼,朱熹之于辛弃疾在时间上又发生了耦合,这种耦合,具有历史的必然,是宋代社会心理内在的二重性结构的必然体现。

与汉唐的相对开放、相对外倾、相对热烈的文化类型不同,宋代的文化类型是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③。重内虚外的社会结构使宋

^① 参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五章“宋学与北宋其他层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 参见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第6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更多地“沉潜向内”，在扩疆拓域建功立业方面，宋人缺少了汉唐那种立马横刀、威凌八荒的民族自信，但在体察天人、品味情理方面，宋人却达到了汉唐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主体及个体自觉。这种内向的主体自觉朝着两个极端分化，而又奇妙地在社会各个层次乃至具体个人身上混合了起来。这就是一方面，宋代的士大夫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伦理济世精神，在对现实痛心疾首之际，反省人生意义、宇宙社会秩序以及历史文化的发展，理性的思考和伦理的规范成了这一时代有志之士的追求，宋人自己就认为“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陆九渊集》卷三四引王顺伯语），这表现了宋人社会理性的自觉。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又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生命本体意识，表现出对个体存在、人性自由、情感满足等方面的自然而执著的关注和渴念，有人甚至逃遁、退避于现实世界之外，着意于心灵的安适与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这表现了宋人个体感情的自觉。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结构，形成了“理学”和“宋词”这一双向对峙的文化形态，而这双向对峙的文化形态，又正好满足了宋代士大夫的心理需要。宋代士大夫可能在社会政治的领域内高喊周孔道德，标榜儒家教义，一本正经地强调仁义道德，而在私人生活领域里却也或沉溺于声色，或浪迹于田园。

三、文化心理影响下的审美意识

在宋代审美意识领域，一个突出的矛盾现象是：一方面，伦理教化及政教功能说对审美领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紧逼；另一方面，审美领域又出现了与伦理教化说的空前背离。表现在审美意识上，则是功利与超功利、治政与言情、载道与吟味、学思与心悟、质理与情文等等日益明显的对立与交峙，如果说在中国古典美学论史上宋代以提供了最极端的审美教化治政功能论而令人瞩目的话，那就还应该说，宋代也以创造了最彻底的审美自由感受论而同样令人瞩目。

在这一时期，既有大张旗鼓的以古理圣道之政教内容为要旨的古文